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60年（2）

雷云

2009-9-11 10:29:54

来源：《红旗文稿》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总的来说，在后30年中，我们党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线和主题，联系历史和现实，沿着科学的轨道，继续探索如何进行“第二次结合”，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体现在理论上，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一言以蔽之，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大推向前进了。

三、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启示

回顾、反思、梳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很有必要认清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关于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历史联系。首先，前30年理论创新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后30年理论创新主要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它们之间是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这不仅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还因为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坚持和继承。有些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是片面的。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和国家长达27年，在如何建立、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提出过许多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给毛泽东思想下的定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次年十二大党章在其中的“中国革命”后面加上“和建设”三个字，此后党的有关权威文献都沿用十二大党章的表述，足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所以决不能忽视更不能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关系。

其次，有些同志虽然肯定毛泽东同志上述两部著作的理论价值和重大意义，但认为在他的晚年，理论上就只有错误，而不再有值得肯定、更没有称得上贡献的东西了。这是不公正的。事实上，即使他步入晚年，陷于“左”的迷雾之后，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反思“大跃进”、“共产风”的时候，还是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关于对我国国情和国力的估计，关于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利用价值规律，关于学习外国，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划分等，提出过许多闪光思想和独到见解，后来都为邓小平理论所吸纳，从而与邓小平理论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它们或

相同，或相通，或相似，或相辅相成，只不过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罢了。所以，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应当忽视对毛泽东同志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部分的肯定和研究。

据此可以说，毛泽东同志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他所作的积极探索和提出的正确理论观点，为后30年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准备了前提，打下了基础。当然，他晚年的严重失误和错误，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损失，从反面对后30年有借鉴和警示意义，使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我们一定要历史地看问题，把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党的理论创新看成一个整体，要看到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历史联系，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不能用后30年去否定前30年，更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

(二)关于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第一，必须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同层次又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则是整体、基础和本原。所以，只有首先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才能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只有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才会有科学的社会主义观。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这可以从各个层面和角度作出说明，但是从精神实质上来理解，才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式的理解，把许多“左”的观点附加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片面理解为主要是甚至等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才会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导致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种种失误和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严重挫折乃至倒退。邓小平同志针对这一历史教训，于80年代初、中期先后提出：“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最注重”、“基本原则”三个定语，都把马克思主义最终落脚到发展生产力上，揭示了从总体上和终极意义上如何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和真谛。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抓准生产力这个核心问题构建的新马克思主义观。以此为指导，合乎逻辑地逐步回答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怎样从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出发。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根本前提。前30年我们发生的种种失误，无不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够有关。尤其是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把现实社会既与过去的过渡时期混同起来，用过渡时期的一套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来对待和处理新时期的各种重大问题，又与以后的成熟社会主义社会等量齐观，勉强去做将来才能做的事情，但殊途同归，造成的共同结果是“左”，是严重脱离实际。正是这一历史经验教训，使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冷静下来重新全面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作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重要判断，在党的十三大上进而把它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这就是我国当前最大的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一切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这一理论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准确地确定了历史方位，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找到了立足点，为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从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设了必需的前提条件。

第三，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实事求是，怎样解放思想。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实际，才谈得上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这两个“弄清楚”，都离不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因为思想路线问题，从来就是关键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也讲实事求是、讲解放思想，但不善于把它们统一起来，所以既不能真正实事求是，又不能真正解放思想：一方面，离开实事求是讲解放思想，使解放思想失去了正确方向。比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在“破除迷

信，解放思想”的口号下发起的，在运动中头脑发热，急于求成，急于求纯，急躁冒进，急功近利，甚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另一方面，离开解放思想讲实事求是，使实事求是异化为停滞保守。比如，尽管天天背诵老祖宗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却不愿正视国内外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想问题办事情往往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马列的本本和“语录”出发，导致全党上下处于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教训，把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放在首位，并把解放思想纳入进去，其后邓小平同志还作出“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经典式论断，以解放思想为实事求是的前提，以实事求是为解放思想的准则，把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后30年，就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精神实质，来分析、研究和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重大问题，这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境界，出色地写就了“结合”的新篇章。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